

KIN2110 vår 2005

Kinesiske tekster

Innhold

北京话（侯宝林）	2
懺悔錄（馮驥才）	6
誕生，一九六九（郝譽翔）	1 4
嗅味族（莫言）	1 9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余英时）	2 8

I tillegg til disse tekstene leses sakprosaetekster i utvalg ved Harald Bøckman.

北京话

侯宝林

甲 说相声需要嘴呀。
乙 是啊。
甲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
乙 哎。
甲 早晨起来啊，用功，有基训啊。
乙 啊。
甲 基训啊。
乙 基训？
甲 基本训练。
乙 啊，那怎么训练？
甲 把口型练一练。
乙 哦。
甲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乙 啊。
甲 另外得说，嘴得练，舌头得练。
乙 那是啊。
甲 哎，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需要嘴呀。
乙 是啊。
甲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
乙 哎。
甲 没毛病的人也得说呀。
乙 那是呀。
甲 你说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乙 对。
甲 一个字儿也不许罗嗦。
乙 哎。
甲 可谁也免不掉罗嗦，是吧？
乙 哈哈，罗嗦。
甲 罗嗦，这是最大的毛病。
乙 哦。
甲 就是功夫问题。
乙 是吗？
甲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乙 哎，练练嘴。
甲 练练嘴。
乙 嗯。
甲 你看哪，我们那马增芬同志。
乙 嗯。
甲 她嘴最好。

乙 是吗？
甲 因为她总唱啊，总唱那“六十六岁刘老六”啊！
乙 啊。
甲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先唱四遍，我们都做早操，她不去。
乙 她怎么样？
甲 她唱绕口令。
乙 哦。
甲 她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乙 这怎么也属于体育的一种？
甲 这叫口腔体操。
乙 啊？这嘴也练体操哇！
甲 哎，这也得练。
乙 这好。
甲 所以她嘴好。
乙 那倒是啊。
甲 说的这个字儿，要清楚。
乙 对。
甲 口音要正。
乙 哎。
甲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乙 哦，普通话？
甲 说普通话。
乙 噢。
甲 大家都听得懂。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乙 哎。
甲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你颠儿了”、“撒丫子啦”、“孬啦”。你比如说一个“吃”吧。
乙 哦。
甲 一个“吃”就有很多说法。
乙 啊。
甲 这儿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乙 这不就得了吗？
甲 你把它吃了。
乙 啊，吃了。
甲 有很多词儿形容“吃了”。
乙 还有什么词儿？
甲 你把它餐了。
乙 餐了。
甲 “餐”原来是文言。
乙 啊。
甲 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乙 哦？
甲 这算两用的。
乙 啊。

甲 你把它餐了。
乙 餐了。
甲 你把它啃了，你把它开了。
乙 开了？
甲 还有，你把它捋了。
乙 咳。
甲 再多用一字儿，你把它垫补了。
乙 您这个，这叫什么话呢？
甲 这就叫做北京话的土语。
乙 哦，土语，嗯。
甲 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乙 那是啊。
甲 你非得说普通话。
乙 对。
甲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乙 是啊。
甲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乙 对。
甲 说北京话，别说土话，就是普通话。
乙 噢。
甲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乙 是啊。
甲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乙 哎。
甲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乙 那倒是啊。
甲 像北京土话这路话不行啊。
乙 啊。
甲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论啊？”
乙 哦，怎么论？
甲 怎么论。
乙 嗯。
甲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论斤多少钱？”这个“论”字儿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论”字。
乙 哦，“论”！
甲 论，论斤要，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乙 哦，是是。
甲 是不是？
乙 嗯。
甲 过去也有过，说让人都学国语，叫什么？叫国语啊。
乙 啊，国语。
甲 国语。就没推开。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得不是味儿啊。
乙 国语。
甲 过去那个电影里，不是净说国语吗？

乙 哦。

甲 一说话这味儿：“好喽好喽，我已经知道你的心里，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乙 这就叫国语啊。

甲 哎。“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喽好喽，我们俩一道走好喽！”就这味儿。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乙 据说他们这都是北京话。

甲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这就叫北京话，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乙 哦？

甲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啊。

乙 是啊。

甲 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北京话有特点，说得流利，说得快。

乙 哦。

甲 你走街上，你听那北京话：“三轮儿！”“哪儿去啊？”“东四。”“五毛。”“三毛。”“四毛吧，多了不要。”“站住，拉吧。”得。

乙 这话说得干脆啊。

甲 干脆吗？

乙 嗯。

甲 流利。

乙 是嘛。

甲 你说要跟过去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乙 啊。

甲 走街上都那路北京话：“这辆三轮车谁的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儿的这位也这味儿。

乙 也这味儿。

甲 “哦，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哦，我真得感谢你了！”

乙 这有什么感激的？

甲 “你要到哪里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喽。”“哦，东四牌楼！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住家就在那里。”

乙 啊。

甲 “哦，你给八毛钱好喽。”“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喽，哎，你自己考虑一下。”“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哟！”

原作 侯宝林
1955年

馮驥才

一百個人的十年

第24章 懺悔錄

1966年19歲 女

B市某歌舞團演員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哎，作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這是誰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準能活得沒有失誤，活得聰明而真實，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無從彌補，愈活愈沉重，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我多想重活呀，哎，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債，可以想辦法去償還，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那就註定無法挽回，一輩子帶著愧疚，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嘿，作家也沒轍了吧。有人說，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註定人是悲劇性的，你說對嗎？既然悲劇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認了；認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是吧……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東一榔頭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八寶山那次？對，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賦，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知道他在抗日期間，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積極宣傳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爸爸他們千辛萬苦，轉移到昆明，常常半饑半飽站在舞臺上為了喚醒民眾，保家衛國……在我的記憶裡，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被輪換地抱來抱去，他們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愛的小貓兒。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愛我的人。我說他好，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信賴、喜愛、尊敬，這是一種直覺；我說他最愛我，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疼愛、鼓勵、信賴，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這也是一種直覺。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準。

你想想看，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我會怎麼反應？當然會堅決反對，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太簡單、太純潔、太天真了。我十三歲呀，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我們在院子裡上課學習戲劇的“起霸”和“趟馬功”，腿繃不直，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嚇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因為我天真可愛，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向外國首腦獻花。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毛主席接過花，還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興。”這拿俗話說：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我已經打扮好，後腦勺兒上扎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老師們都誇我漂亮，我興奮極了——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沉著臉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麼事。”我問，真是晴天霹靂。我對他下面的更沒有半點準備。

班主任老師問我：“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反革命，敵人，壞蛋，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我說，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

他對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是最愛你的。你應該聽老師的話，

你爸爸原先不錯，可是他現在變了，在單位裡反對革命，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為什麼？因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你在電影裡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後來成了叛徒，大壞蛋。懂嗎？對，你懂了。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但他變了，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

我流著眼淚，信了，就這麼簡單，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沒見他。

如果是現在，我才不信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許多大人都信，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牽連，怕失寵，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應該說，開頭是絕沒有的。

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璧無瑕。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追我，還開槍打我，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

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居然連稱呼也沒寫，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

“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間來，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

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可是你想，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爸爸就是一聲不吭，頂牛頂了一年多，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直插心窩，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最喪盡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他在北大荒，當聽說我參加了《魚美人》舞劇演出，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人民畫報

》，用放大鏡從畫報的《魚美人》的劇照找到了我。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屍體從床上抬定時，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紙邊都磨毛了，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媽媽還說，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得了肺炎，貧病交加，活活餓死，後來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媽媽親自去北大荒領他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服，爛帽子，一個舊搪瓷水杯和洗臉盆，再有就是這本畫報，還有一個日記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記本上寫真實的感想，都是記事，天天的流水賬。但日記本中間卻寫了這麼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從《人民畫報》上找到了她，她更可愛了，我興奮地直哭！”這便是他留給我的遺言。

這遺言一行字，像一條鞭子，我重復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這年，我十五歲。我們分手兩年，一個情斷義絕，一個至愛情深，我沒給他再去過一封信，更談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己，在這兩年裡，我與他一直斷然不再有任何聯繫，難道只是因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結果？真的一點也沒有因為怕壓力、怕連累自己、怕不受組織信任與重視的私心？我不敢承認有，如果承認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責。但我可以告訴你，有……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天壓下來了。所有重大外事與政治活動實際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說我十四歲就可以破格入團，從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別的夥伴們去參加重要活動演出，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院裡溜達，深深嘗到了政治歧視的厲害。原先對我特別好的那些老師，突然變一張臉，像川劇裡的變臉；他們想盡辦法迫使我去揭發爸爸，我能揭發什麼？那些老師因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們憑功請賞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擠我……

但這樣就應該拋棄爸爸嗎？

特別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世界一片暴風雪，冰天凍地，只有女兒是他唯一溫暖的依傍呀！

如果現在以我的死能換來爸爸的復活，我寧願馬上去死，但當時為什麼因為懼怕壓力就把他拋開？我恨“劃清界限”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把刀斬斷我們父女，而拿起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別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來個很大轉變。我轉向面對自己，不再是面對外部世界。

我開始不愛自己，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練業務。因為爸爸的一個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為優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幹，幹得出色，做為補贖自己的罪過！

文化大革命到來之後，我的家整個完了，媽媽和弟弟妹妹被趕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我前邊講了，我已經不關心外部的事，這期間面對“文革”，我非但不怕，好像什麼也不在乎了。紅衛兵說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說他是好人，巴不得他們把我打死，為父親挨揍，死去活來，良心才得安寧。特別是本團的革命派們嫉妒我的業務好，批我“白專典型”，不叫我加入“樣板團”。那時除去樣板戲根本沒有別的演出，我幾乎失業了；我卻堅持練功，如果我垮下來，父親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堅持練功，晚上躺在床上還練腹肌；乘坐電車時我從來不坐，借著車子晃動好練身體的穩定性……

文化大革命對整個社會的空前摧殘，對人大面積的迫害，使我的頭腦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諒自己曾經的罪過。這期間，雖然我在社會上沉默、冷靜、很堅強，但回到家裡就軟弱下來。我想爸爸，而且這種思念與日俱增，只要串門來的人談到右派、北大荒、勞改、批判鬥爭，雖然沒有觸及到爸爸，我也哭，嗚嗚的，哭起來就止不住。哭到最後，只覺得人空了，拿什麼也填補不上。

七五年廣州交易會找到我們團，要求派演員去給外賓跳舞。因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還說屬於“給出路政策”，當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這可到了給爸爸爭口氣的時候了。我跳“紅綢舞”，場場滿堂彩。每次謝幕，我面對著熱情沸騰的台下，卻像對著漆黑冰冷的陰間，面朝著遙遠而不可及的父親，對他

深深鞠躬。心裡默默對他說：我想他、愛他、請求他諒解，我感到終於有機會、有辦法來贖罪了。可是，這股勁憋得太久，一發而不可收拾，興奮，激動，拼命跳，忘乎所以，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突發心跳過速，常常跳得一分鐘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幾個月躺在床上，人也脫相了。醫生說不能再幹跳舞這行，這怎麼行？我一邊養病，一邊偷偷做簡單練功，還默默請求父親保佑我，讓我站起來，回到舞臺上，給我贖罪的機會，這罪還像一塊大石板壓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歲，風華正茂，在我印象中他總是那種精力旺盛的樣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舊在世，也不過六十剛過，相信他那種對生活、對人的熱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歲月，他卻在地下一動不動長眠，想起來真是淒苦極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發起，為他開追悼會，靈堂設在八寶山公墓。主辦追悼會的人叫我寫一份悼詞。我心裡有許多話要說，答應了。拿起筆來，百感交集，悲憤交加，激情奔涌，要報復，要發泄，要控訴，但在靈堂裡念起這悼詞時我卻出奇的冷靜。沒想到參加追悼會有這麼多人，黑壓壓把靈堂站滿，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們聽著我一字一句地念：

“親愛的爸爸——”

我終於叫他了，壓在心裡整整二十年的聲音，終於在大廳廣眾堂堂正正、驕傲自豪地呼叫出來了。然而，我居然沒有激動，而是異常平靜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這裡，既沒有痛苦，也沒有高興，我只有一種怨恨！

我恨我們太軟弱了。軟弱使我們屈從於外界的壓力。軟弱使我們在您最痛苦的時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愛您。軟弱使我們只能瞧著命運把您一個人拋給了苦難。

我恨我們太無知了。無知使良心遭受欺騙。我至今不能原諒我自己，為什麼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責為人民敵人的謊言。爸爸，您還記得那時我給您寫過的信嗎？那信的開頭沒有稱呼。我寫道：‘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

雖然當時您肯定非常痛苦，但還是用放大鏡困難地在《人民畫報》‘魚美人’舞劇劇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親爸爸，我知道您不會怪罪一個十三歲的無知的女兒，可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我越來越痛心，越來越不能原諒我自己給爸爸心靈所壓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愛’本身就是一齣人間的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化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靈魂的，但我覺得像爸爸這樣一個一生正直、熱誠、善良的人應當有靈魂。他也不應當被人們忘記。他那孤苦的靈魂應當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這麼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經過他們的努力能夠在北京的八寶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嗎？爸爸，我愛您，想您呀——您聽見了嗎？您肯定是聽見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個念悼詞的過程中，四周安靜極了，安靜得聽得見每一個輕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嗚咽。我自己卻沒有哭，真的，我聽見自己異常清晰的口齒，把每一個字送到靈堂又寬又大的空間裡。我甚至聽得見自己轉換句子時換氣的呼吸聲。我感覺好像身在天堂裡，在神靈光輝的照耀下，對著爸爸講這番話的。我感到他巨大、溫暖和寬厚的存在。並感到他真的原諒了我！一切恢復如初！這一剎那，我仿佛被自己淨化了，被大徹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誠，被全心傾心的愛，把自己從無邊的苦海裡拯救出來，向上飛騰，飛進一片光明透徹、一塵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輕鬆、自由和舒服呀！

從這以後，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為我就此解脫了嗎？那就錯了！開頭我對你說過，如果欠著活人的債很好辦，但我欠的終究是早逝的爸爸。我總琢磨他臨死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最疼愛的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他怎麼會不感到親離的疼痛與人世的悲涼？每每想到這裡，那悔恨的陰影又把我遮蓋起來。這也許是永生永世難以解脫的了。

中國人的宗教不講懺悔。沒有懺悔，人會活得愈來愈狠，或愈來愈累。對於有心靈生活的人講，沒有懺悔就無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懺悔室。每逢此時，我就躲進我幽黯的懺悔室裡，與自己喃喃對話。

哎，作家，我對人生有這樣一個理解：人生有一萬條路，但每個人只能走一條。如果你選錯了，即使後來知過改過，曾經的過失也無法彌補。……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會是單純積極或消極的。殘酷的人生與社會教給我的是：永遠再不要單純，永遠再不要做違心的事。寧肯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價，也不要為違心付出悲慘的代價。

這是我從八寶山爸爸靈堂走出來後，悟到的幾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懺悔可以使人擺脫魔鬼。

郝譽翔

逆旅

誕生，一九六九

一九六九年，我誕生於台北的鐵路醫院。

這個誕生地聽起來就像鐵路餐廳一樣的滑稽。讓我聯想到車站擁擠的人潮，冒著黑煙的火車，鐵軌的油漬，躲在角落的空便當盒發出臭酸味，還有黏著白痰、鼻涕、尿液、果汁、汽水的地板，這些畫面全和我的嬰兒床混在一塊兒，以至於我從來不願意再回到那個地方去求證、憑弔，甚至根本不相信有什麼鐵路醫院的存在。也因為這個緣故，以下的敘述都將根據我母親的回憶而來，當然，不可否認，其中也摻雜了我的回憶，當她告訴我這些故事的時候，我還是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十歲以後，除了柴米油鹽雞毛蒜皮之類，我們似乎再也沒有交談過任何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事物。這些積存在我腦海中的陳年往事，便成為我母親的回憶再加上我的回憶的綜合體，那就像是一個混合了巧克力粉的發酵麵團，可以扭曲變形到什麼程度呢？恐怕連我也無能估計。

根據我母親和我的共同回憶，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的半夜，她起床小便，迷迷糊糊坐到馬桶上，一使力，子宮竟然一陣陣的收縮，她這才從夢中驚醒過來，猛然想起肚子裡面原來還有一個我。她的下腹部開始不尋常的急促陣痛，那痛的力量淨把她往下扯，她雙手使勁的扶住洗手台，坐在馬桶邊緣憋了老半天，才終於憋出一句淒厲叫喊。還在睡夢中的父親聽見了，馬上從床上彈起來，牽出他的偉士牌摩托車，一邊卻不禁回想著剛剛出現在他夢境裡的陌生女孩。一直等到二十年以後，父親才告訴我，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在夢中見過我了。他竟是這世界上第一個認識我的人。

當父親在發動摩托車的時候，母親捧著肚子，迫不及待一下就跳上車の後座。這跳車的動作讓她想起中學時代體育課的跳箱，她沒有跳過去，雙腿叉得大開，就坐在箱頂的海綿墊上，砰得好大一聲，站在旁邊觀看的同學嘩的像潮水發出一陣哄堂爆笑。她坐在箱頂上，低頭一看，一灘指甲似的血跡從她的短褲底部緩緩滲透開來。而現在母親坐在摩托車の後座，車子在路面的坑洞中跳躍著，椅墊不斷撞擊她的陰道口，但這回她可不敢再低頭往下看了，怕看到我的頭已經鑽出，一見著她，就要張嘴號啕大哭起來。

其實，如果不是我這麼急著要來到世上，而爸不是把摩托車騎得這般飛快的話，他們將會發覺那天晚上月亮格外耀眼，像只發光的琉璃盤，一股今年入秋之後最優雅的涼風正從海面緩緩吹送，彷彿某處點燃了鴉片夾雜麝香的魅惑氣息似的，許多情人們受不了這股浪漫的召喚，公然站到路旁的椰子樹底下，深深擁吻。而爸的摩托車急駛過去，唰的一聲把那時流行的迷你裙掀開，一朵一朵有如白玉花蕊沿街陸續綻放。爸的摩托車急駛過夜市，海產攤上的酒客正在津津有味的討論八月二十四日金龍少棒勇奪世界冠軍的那一戰，余宏開和陳鴻欽在第二局下半連續擊出安打，而投手陳智源如何連連三振，粉碎美西隊反攻的最後機會。旁邊正在啃當歸鴨腿的歐吉桑，抬頭看到急駛而過的摩托車，飛快的速度讓他想起二月二十四日那天遠航從小港機場起飛的春節加班機，載著他的女兒和女婿，然而十八分鐘以後，卻墜毀於台南的二甲溪溝。歐吉桑悄悄流下兩行熱淚，滴在黑色的當歸湯裡。爸的摩托車急駛而過，劃開涼爽的夜，我的頭皮被顛簸的路面震得隱隱發麻，造成我日後偏頭痛的宿疾。可是真正令我失望的是，這個世界的人們似乎沒有因為我的降臨而感到絲毫驚喜，只有母親一雙汗涔涔的手不斷地伸過來，想要把我的頭再塞回到她的子宮裡面去。

一九六九年，與我一同誕生的人現在年紀都還不夠老，尚來不及成為偉人，值得一提的只有美國當紅的歌手巴比·布朗，芝麻街美語的大鳥，閣樓雜誌，巨型噴射機波音747，中國電視公司，國父紀念館，他們都和我同年來到這個世界上。因此當我在一九九九年走入國父紀念館，看見樑柱掉落斑駁的紅漆，老舊的壁鐘已經停擺，簷下懸著經年的鳥巢，蜘蛛網隨風蕩漾，在在讓我觸目驚心——原來我也有這樣陳舊的歲數了？然而，在一九六九年死去的人恐怕更多，有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越南總統胡志明，歷史學家吳晗，自由鬥士殷海光，五四先驅羅家倫，在我還來不及見他們一面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留下書裡一堆沈默的文字和圖片。在數不清的人事來來去去生生死死之間，我在一九六

九年的年鑑中貼上我的生日，然而，我的誕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截至目前為止，最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莫過於我的家人，而且可能僅有他們知道而已。一九六九年，我的父親四十歲，我的母親三十歲，一個屬龍，一個屬虎，當他們聚在一起，便註定了龍虎鬥的命運。不過，根據母親的說法，我的誕生才是真正開啟他們鬥爭的端倪。因為在我三歲以前，睡覺時都要握著大人的手，才肯停止啼哭，安心闔眼，而每次等到母親哄我入眠以後，再回去床上，父親早就睡死了。母親認為，這一點正是造成他們日後漸行漸遠的根源。

在母親口中，那個還不會說話不會走路的嬰兒的我，簡直像是撒旦送來的惡魔，一手終結掉他們三年不到的婚姻。可是長大以後，我才發現一九六九原本就是一個大顛覆的叛逆年代，我不禁懷疑我體內生來便已種下革命的骨血。那股叛逆的風潮從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法國學潮開始燃起，警民衝突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一場內戰；五月十一日，三萬多名西德學生集結波昂街頭，抗議戒嚴法實施；一九六九年一月，捷克學生楊·帕拉赫自焚抗議蘇聯入侵布拉格；一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學潮，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戒嚴三個月；六月，紐約格林威治村同性戀者焚燒「石牆」酒吧，抗議警察臨檢；八月，北愛爾蘭恐怖份子動亂；萬名嬉皮在紐約州「伍茲塔克音樂藝術節」中公然嗑藥雜交；十一月，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美國華府二十五萬人參加反越戰大遊行；十二月，愛爾蘭作家貝克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等待果陀》為這個年代劃下了荒謬的問號，以及句點。

一九六九，充滿熱力的年代，反抗與純真同在，樂觀與放縱並存，我心深嚮往之。

難怪母親說她懷我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吃，就想吃冰塊，成天肚子裡頭有團火在燒一樣，就在連續吃了十個月的冰塊之後，她的胃變成一個冰窖，連米飯都消化不了，幾十年來因而維持一副人人稱羨的纖瘦身材。我看著母親扁皮如豆腐皮的腹部，她所有的食慾彷彿都已經被胎兒時期的我吸乾了，我這才瞭解，反叛的因子早就在我的血管裡面根生，似乎我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推翻自己的存在，而那賜予我生命的父母，首先便成為我革命的犧牲品。不過，預言總是比事實還慢了一步，就在我六歲那年，一位算命仙看到我的紫薇斗數時，不禁皺緊眉頭，說這個小孩天生就與父母無緣，尤其主剋父親。我的母親聽了以後，只長歎一口氣，她覺悟得太晚，如果早知如此，一生下來就把我送走的話，或許她和父親的生命史就要完全改寫。

我的母親牽著我從算命館走出來，她低頭看我，看著這個摧毀她生命的小惡魔，手不禁微微的發抖，但總不能就這樣子把我扔在馬路旁邊吧。我們走過麵包店，麵包出爐的香味糾纏住我的鼻子，我扯著她的衣角，大聲喊餓，她猶豫了一下，還是選擇走進店裡。在那個年代麵包店裡僅有兩種口味——波蘿麵包和香蔥麵包，她破例大方的同時買了兩種給我吃。於是我們從士林沿著百齡五路繼續走，走到石牌，那時路的兩旁都還是稻田，秋天來臨的時候，紅磚道上堆滿了金黃色的穀粒，打穀機打出棉絮一般的米糠，在空中飛舞。母親穿著桃紅色的迷你裙，露出一節白皙的大腿，底下修長的小腿尤其讓我感到嫉妒。她牽著我走在紅磚道上，繞過小山丘似的穀堆，兩隻眼睛卻望向天邊，心思不知飄到多遠的地方去，可是，就因為手中牽著我的緣故，她哪裡也去不了。她悲哀的握住我的手，而我箍緊了手指，像一條一條小蛇鑽進她的指縫，雙腳大力向前踢正步，神氣地抬起下巴，因為我知道，我到底才是母親真正的主人。

一九六九年，革命的激情彷彿都在遠方陌生的國度裡燃燒，與這座寧靜的台灣島毫不相干，但其實不然，它們飛越千里，穿過海洋，匯聚到我的身上，張開大口，吞噬掉我的父母，吞噬掉我周遭許多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物。我不得不承認，一九六九年九月底橫掃全台的艾爾西颱風與我有關。這個颱風造成九十多人死亡失蹤，財物損失難以計數，我的外公因而破產，從此一蹶不振，淪為一個脾氣古怪的窮光蛋。在他死前，他仍然堅持那次颱風是我帶來的，並且拿出那本我早就已經看過上千次的面相書，作為佐證。當我出生那天，他去醫院探望我，第一眼就看見我右眼底下一顆黑痣，不知為什麼，這黑痣讓他感到極度不安。等回到家，他馬上查面相書，在那顆痣的方位找到了「水厄」兩個字，果然，一個禮拜後艾爾西颱風應驗了他不祥的預感。

我的誕生究竟有何意義？難道我在不知不覺中做的就是謀殺，謀殺，謀殺……

如今我坐在一九九九年，和當年我的母親一樣三十歲，回頭看，看見我的母親從一九六九年黃昏的薄暮中走來，她挺著滾圓的大肚子，手中捏條小手帕，看到路邊賣剉冰的攤子，正方形的大冰塊不斷冒出白煙，她的口水忍不住就要流下來。我說，妳千萬不要吃啊，吃了一輩子害胃病。但是她不聽我的勸告，坐下來，點了一大碗，她閉起眼，深吸一口氣，享受銳利的冰在齒舌間融化的美妙滋味。而一隻蒼蠅悄悄溺死在她碗中甜膩的紅豆裡。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深夜的急診室。母親捧著肚子，跳下摩托車，衝進大門，往綠色的病床一躺。當護士還在忙著打電話給醫生時，我已經等不及要來到這個世界，遂行革命的野心了。我看見爸爸捲起袖子，伏在母親高高舉起的雙腿之間，攤開他巨大的手掌，親自迎接我的誕生。我警告他說，你千萬不要啊，快點把我推回子宮裡面去，否則你要後悔一輩子。但是他不聽，他是我這輩子第一個擁抱到的人，也是唯一的一次，因為在冥冥之中，命運之神已經註定我將會大力的把他向外推出去，直到永遠推出我的生命。

我躺在一九六九年的嬰兒床上呱呱大哭。母親剛結束一場與父親激烈的爭吵，臉上盡是狼藉的淚痕，她趴在嬰兒床邊耐心哄我，而父親已經在另一個房間睡著，進入夢中，遂行他外遇的陰謀了。但事情怎麼會演變成這個地步呢？到底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我躺在嬰兒床上，大力搖頭，哭得面紅耳赤，在我的哭聲中，這個家逐漸的分裂開來。

地球仍然在緩緩的轉動著。

一九九九年，我的父親已經七十歲，母親六十歲，伉儷將近三十年，分居在台灣島的南北兩端，但他們沒有一日忘記過一九六九那個充滿爭吵與怨恨的冬天。他們曾經先後告訴我同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因為你.....

如果不是，一九六九，一座隱形的歷史之碑。一座因我的誕生而存在，而消失，而毀滅，而腐敗，而沈默的記憶之碑，被我不停鐫刻與塗改，拓印著我的母親的白髮，我的父親的駝背，以及我的祖先的靈位。

*

嗅味族

莫言

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然后用嘲讽的腔调说：

“好汉，过来！”

我讨厌这种不尊重儿童的腔调，但还是用手指摸弄着圆滚滚的肚皮，一步挪半寸，两步挪一寸，三步一寸五，四步挪两寸，就这样一寸一寸地挪到了饭桌前，等待着爹的打击。爹暂时没有出手，也许是因为他处的位置打击我不太方便吧——他坐在饭桌的正中，两边雁翅般展开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也许他还没有决定该不该给我一顿沉重打击，但作为我来说，根据以往的经验 and 眼前的形势，知道一顿臭揍迟早难免，便硬着头皮，做好了准备。对我这样的坏孩子来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用我娘的话来说就是，我这样的人是属破车子的，就得经常敲打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天不揍，闹起来没够。我爹呼噜了一口野菜汤，咕咚咽下去，问：

“说吧，好汉，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可以撒一个谎，譬如说我钻到草垛里不小心睡着了，甚至可以说我让带着狗熊和三条腿公鸡的杂耍班子用蒙汉药拍了去，幸亏我机智勇敢才逃脱了他们的魔掌——那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正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杂耍班子用蒙汉药拐儿童的就算是谣言吧，说杂耍班子的人只要用手把小孩子的后脑勺子拍一下，小孩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们走。到了杂耍班子，他们就用锋利的小刀子在孩子身上划出无数的血口子，然后马上杀一条狗，把狗皮剥下来，趁热贴到孩子身上，从此那张狗皮就长到孩子的身上，一辈子也脱不下来了。为了防止小孩子泄密，在往他们身上植狗皮之前，先把舌头割掉，让你有口也难言。说有一个小孩子就是这样被杂耍班子拍了去使了酷刑后变成了一个狗人，有一天杂耍班子到孩子舅舅所在的村子去演出，杂耍班子的班主一边敲着破锣一边指着小孩子说：各位乡亲们，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吧，这个孩子的爹跟一头母狗交配，

生出了这个小狗人，乡亲们，可怜可怜这个狗孩子吧……人们一圈一圈地围上去，看那可怜的孩子。那孩子从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舅舅，看到了舅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看见了爹爹还要亲，于是那孩子的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小孩的舅舅心中好生纳闷，心里想这个披着狗皮的小孩子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他马上就联想到几年前姐姐家丢了的男孩，仔细一看那双眼睛，知道就是自己的外甥。他是个胸有城府的人，当下也没声张，等到杂耍班子休息时，装做闲人凑上去，提着那孩子的乳名低声问：你是小什么吗？那狗孩子点点头。舅舅马上就跑到县政府把杂耍班子给告了，破案之后，杂耍班子里那些坏人全部给枪毙了，那个小孩给送到县医院里做了剥皮手术，好不容易恢复了人的面貌，但话是不会说了。——这个故事传得有鼻子有眼，都说村子里的兽医王大爷亲眼看到过那个狗孩子的表演节目。我们追着王大爷让他讲那个狗孩子的故事，但王大爷总是心烦意乱地轰我们：滚开，你们这些狗东西！

没有撒谎，更不敢造谣，我实事求是地说：

“我跟于进宝到井里去了？”

“什么？”父亲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的围着饭桌喝菜汤的兄弟姐妹们也用嘲笑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这些家伙把我当成傻瓜，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到井里去干什么，当然也不能怨他们，因为这件事情的确离奇，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天底下竟然会存在着这样的事。

“我跟着于进宝到他家后园里那眼井里去了。”我对他们尽量详尽地说着：

“昨天下午，我去找于进宝玩耍，玩了一会儿，口渴得很，于进宝家没有水，于进宝就带我到他家后园里去找水喝，他家后园里有一口很深的井……”

母亲打断我的话，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杂种，杂种，你一夜没回来？你在哪里睡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睡，我们跟那些长鼻人一起玩，唱歌跳舞捉迷藏，我们根本不困……”他们没有对我发出质问，但我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从他们停止喝菜汤的动作上，知道他们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或者说他们对我的一夜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他们等待着我往下讲述。我当然非常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尽管于进宝和那些长鼻人曾经要求我严格保守秘密，但我是个

肚子里藏不住话的快嘴孩子，满肚子的新鲜奇遇如果不说出来，非把我憋死不可。我说：“那些长鼻人鼻子有点长，但也不是非常长，比我们的鼻子略微长点，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只有一个鼻孔眼儿，长在鼻子尖上。他们不吃饭，他们嗅味，他们嗅嗅味就饱了，但他们很会做饭，他们做的饭好吃极了，有鸡，有鸭，还有兔子，香极了……”

我正要把一夜奇遇讲给他们听时，刚刚开了一个头，但是我的爹把碗往桌子上一扔，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像一座山丘拔地而起。他越过障碍，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把我打翻在地，然后他就气昂昂地走出了家门。他当然不会去找于进宝核实真伪，他也不会去于家的后园井里探勘，在他的心目中，我说的都是鬼话，连一星半点的真实也没有。

父亲走了，母亲把我从地上揪起来，当然是揪着我的耳朵揪起来，然后她就逼问我：

“小杂种，说实话，昨天夜里你到哪里去？”

“我跟于进宝到长鼻人那里去了……”我歪着脑袋，咧着嘴，痛苦地说。

“还敢胡说，”母亲恼怒地说着，揪住我的耳朵的手又加了一把劲儿，使我的耳朵变成了不知什么模样，“说实话，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耳朵疼痛是热泪盈眶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感到委屈，明明我说的是大实话，但他们却以为我在撒谎；明明我是冒着被长鼻人惩罚的危险把一个美好的秘密告诉他们，但他们却以为我在胡编乱造。我的那些可恶的兄弟姐妹们见我受到惩罚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幸灾乐祸，他们得意地眯着眼睛，脸上都带着笑意，那四个年纪比我小的，可能怕我收拾他们，笑的还比较含蓄，那四个比我大的，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得意之心。他们甚至添油加醋地说一些让母亲更加愤怒的话，譬如我那个生着两颗虎牙的大姐就很严肃地说：

“最近有人把生产队的小牛用铁丝捆住嘴巴给弄死了，咱家可是有这种细铁丝——”

“你就做死吧，”母亲忧心忡忡地说，“牛是生产队的宝贝，害了生产队里的牛，那就是反革命！”

“咱们干脆对外宣布，”我的那个二哥说，“与他断绝关系，免得牵连到我们。”

到底还是母亲境界高些，她瞪了那位很可能是我的二哥的家伙一眼，说：

“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吧？你们都是我养的，能断绝得了吗？”

母亲松开了揪住我耳朵的手，我感到耳朵火辣辣的，知道它的体积大了不少。我的耳朵比常人的耳朵要大，原来也大不了多少，因为人们的揪和拧，它们变得越来越大。

“说吧，”母亲疲乏地说，“你这一夜倒底到什么地方去？你如果不说，就别想吃饭！”

我瞄了一眼锅里那些黑糊糊的野菜汤，看了一眼桌子上那碗用来下饭的发了霉的咸萝卜条子，心中暗暗得意，初进家门时说实话我心中还有些惭愧，因为我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美味食物而我的父母吃这些猪狗食。但现在我一点愧意也没有了。我打了一个饱嗝，让胃里的气味汹涌地蹿上来；我陶醉在美好的气味里，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我看到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都把鼻子翘起来，脑袋转动着，在搜寻美好气味的源头。在饥饿的年代里，人们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十里外有人家煮肉我们也能嗅到，当然也说明了那个时候空气特别纯净，一星半点儿污染都没受。我的兄弟姐妹根本想不到让他们馋涎欲滴的气味竟然是从我的胃里返上来的。说不是故意地其实也是故意地我又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然后大张开嘴巴，这时我看到，我的那些兄弟姐妹的目光全都集中到我的嘴巴上了，如果能够，我相信他们都会奋不顾身地钻到我的胃里去看个究竟。

母亲的嗅觉尽管不如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嗅觉灵敏，但她毫无疑问地也闻到了从我的嘴里散出来的美食气味，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洋溢着讶异和惊喜，我知道她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她很可能以为自己在做梦，对她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换了我也会这样，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从我这样一个穷孩子嘴巴里发出这样的气味比狗头上长角还要稀奇。但铁一样的事实就摆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面前，他们不愿意相信也得相信，美好的气味无可争辩地从我的嘴巴里往外扩散，逗引得他们百感交集眼泪汪汪。我知道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心中对我充满了嫉妒和仇恨，他们恨不得把我的肚皮豁开，看看我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我知道母亲不嫉妒我也不仇恨我，但她也很想知道我到底去什么地方吃了些什么样的好东西，然后就可以让我当向导，带领着全家去会一次大餐。我的那个生着虎牙的姐姐已经急不可耐地冲了上来，用她的粗糙的手扒开我的嘴巴，凶

巴巴地问：

“小坏蛋，你还真地吃到了好东西！快说，你到哪里去吃到了好东西？快说，你吃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的兄弟姐妹们跟随着虎牙姐姐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我。这时我真是得意极了，想起方才父亲用他的铁巴掌扇我耳光时这些家伙幸灾乐祸的表情，想起这些家伙平日里对我的欺凌和压迫，我的心中无比快意，六月债，还得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用斗量，这些坏家伙大概从来没想到我这个土豆堆里的最蹩脚的土豆，竟然会好运临头，他们根本想不到还会求到我的面前，刚才我还巴不得将我的奇遇告诉他们，但现在我已经不想把秘密告诉他们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凭什么要告诉他们？我如果是个大傻瓜我才会告诉他们，我如果不是一个大傻瓜我就不会告诉他们。母亲也用恳求的目光望着我，显然也是想让我把秘密吐露出来，但是我耳朵上的疼痛提醒了我，让我想起她几分钟前还揪着我的耳朵恨不得揪下来的悲惨往事，于是我的意志就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了。我决心把这个秘密保守到底，我必须遵守我与于进宝小哥哥的约定，我更必须履行我们与长鼻人之间的诺言，我为刚才差一点泄露了机密而后悔，幸亏他们没把我的话当真，但现在他们从我的嘴巴里嗅到了气味，他们很可能当真了。我惊愕地明白了：其实我已经泄露了秘密，我提到了于进宝家的水井，提到了长鼻人和他们的美味食品。我的这些饿疯了的兄弟姐妹们，很可能马上就会下到于进宝的井里去看个究竟！这时，母亲把我的兄弟姐妹们分到两边，走到我的面前，我感到她的手正在温存地抚摩着我的脑袋，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不要上当受骗，刚才就是这只手差点儿把你的耳朵揪下来！她现在抚摩你是为了让你吐露机密，而一旦你吐露了机密，她的手就会重新揪你的耳朵！我听到她对我说：

“好孩子，告诉娘，你昨天夜里到底到哪里去了？你到什么地方去吃了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灵机一动，想起了虎牙姐姐说过的话头，我宁愿搬起一个尿盆子扣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泄露机密，于是我就伪装出犯了严重错误的模样，吞吞吐吐地说：

“娘，我错了……昨天夜里，我跟着是一群野孩子，把生产队里一头小牛用细铁丝捆着嘴巴整死了……然后……他们点上火，把小牛烧熟了……他们让我吃，我实在太馋了，就吃了……”

在我的脑袋上爱抚着的那只手，突然间变成了拳头，像擂鼓一样敲打着我的头，我听到母亲用恨极了也怕极了压抑着的声音说：

“杂种，你就去做死吧，你就等着公安局来抓你吧！”

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有用脚端我的，有用巴掌扇我的，有用指甲掐我的，有用唾沫啐我的……总而言之是转眼间我就成了他们的公敌。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就懒洋洋地散开了。

但昨天夜里确实发生了比做梦还美的好事，有我满口的余香为证，有我的愉快而辛苦地工作着的肠胃为证，有我嗅到野菜汤的气味就恶心的生理反应为证，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记忆为证。母亲把一个筐子一把镰刀扔给我，让我跟着我的姐姐哥哥们去挖野菜。在通往田野的土路上，村子里的孩子们唱着流行的歌曲：一九六四年啊，真是不平凡；饿死了马光斗，爆炸了原子弹；赫鲁晓夫下了台，咱们心喜欢——尽管饥饿但孩子们依然欢天喜地，你追我赶，打打闹闹，孩子队里有于进宝小哥哥，走着走着我们俩就靠在了一起，他压低嗓门问我：

“你没泄密吧？”

“没有……”我心里虚虚地说。

“千万保密，否则咱们就吃不到好东西了。”

我大姐瞪了我一眼，说：

“快走。”

我跟随着她们往田野里走，但我的心已经回到了昨天。

当时，我和于进宝在玩他家那副残缺不全的扑克牌，突然感到口很渴，我就问：

“进宝哥哥你们家有水吗？”

于进宝说：

“你想喝水啦？我们家没水，你如果想喝就跟我到我家后园里去喝吧。”

我就跟着于进宝到他家的后园里去了。他家的后园里有一口水井，一眼非常普通的水井，水很懒，浇园用的。井口上安着一架轱辘，支架上生出了蘑菇，绳子上发出了绿霉，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我们站在井台上，探头往井里望去，起初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看到了井里明亮的水，和水面上我们的脸。一头乱毛，两只小眼睛，一个塌鼻子，两扇大耳

朵——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副好模样，怪不得我的一个姐姐经常骂我“气死画匠”。于进宝哥哥也是一头乱发，两只小眼睛，一个塌鼻子，两扇大耳朵。我们两个简直像用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我的母亲经常无奈地对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说：“你们看看，他怎么越来越像东屋里小宝？”我的一个姐姐说：“太像了，一个娘养出来的也没有这样像的！”然后她就用黑黑的眼睛仇恨地盯着母亲，好像母亲欠了她一笔陈年老账。小宝就是我最亲爱的于进宝哥哥，他在村子里名誉很坏，至于他干过什么坏事，则没人能说出来。

我们看着井里那两张一模一样的脸。看了一会，就开始往自己的脸上吐唾沫。我的唾沫吐到我的脸上就像吐到他的脸上一样。他的唾沫吐到他的脸上就像吐到我的脸上一样。我们的唾沫吐到我们的脸上把我们的脸破碎了，我们的鼻子眼睛混乱不清，于是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

突然，我们嗅到一股奇异的香味。我们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四周是断壁残垣，发了疯的野草，野草中仓皇奔走的蜥蜴，蜥蜴身上闪烁的鳞片……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没有冒烟的，没有人家在炒肉，这香气……这香气……这香气是从井里冒出来的！我们紧张地抽动着鼻子，眼前似乎出现了许多在梦里都没见过的精美食物，有像砖头那样厚的肉，一方一方的，颜色焦黄，冒着热气。有把脑袋扎进肚子上的烧鸡，颜色焦黄，冒着热气。有整头的小羊，颜色焦黄，冒着热气……

我们拽住辘轳绳子往井里滑去，他在下边，我在上边。井筒子深得似乎没有底，我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好像在大风里行走。我的眼前起初是亮的，往下滑了一阵后就慢慢地黑起来。我感到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腿，我的身体往边上一偏，然后脚就着了地。于进宝小哥哥拉着我的手，沿着一条黑洞洞的地道，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我们心中感到害怕，但越来越浓的香气吸引着我们，使我们的脚步不停。不知从何时起，眼前渐渐地明亮起来，地道也宽敞起来。我们看到一道道的光线从一些圆圆的洞眼里射进来，洞眼多粗，光线就多粗。我心中紧张，歪头看了一眼他的脸，看到了他的脸就像看到了我的脸。我们紧紧地拉着手，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浓厚的香气变成了热乎乎的风扑到我们的脸上，随着香风传来了一些哧呼哧呼的声音。我们屏住呼吸，贴着洞壁，高高地抬腿，轻轻地落脚，慢慢地向前靠拢。终于，我们看到了，在前方的一个宽敞的大洞里，有一个平展展的土台子，台子上摆着三个巨大的黑陶盘子，一个盘

子里放着一方方的肉，像砖头那样厚，颜色金黄，冒着热气，肉的上面撒着一层切碎的香菜末儿。一个盘子里放着十几只脑袋扎到肚子里的鸡，颜色金黄，冒着热气，鸡的上面撒了一层花椒叶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头小羊，颜色金黄，冒着热气，小羊身上插了几根翠绿的葱叶。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盘子，都跪着，屁股后边拄着一条粗粗的尾巴。他们穿着用树叶子缀成的衣裳，头上戴瓜皮小帽。他们都生着两只小眼睛，两扇大耳朵，这些都跟我们像，与我們不像的是他们的鼻子。我们是塌鼻子，他们是长鼻子，而且还比我们少了一个鼻孔眼儿。他们跪在盘子周围，脖子探出来，鼻子离食物很近，鼻孔一开一合，那些哧呼哧呼的声音就是从他们的鼻子里发出来的。我们将身体紧紧地贴在洞壁上，好像两只壁虎。有好几次我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怎么样。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长鼻人突然站起来，鼻子哧呼着，脑袋转动着，眼睛分明地与我们的目光相接了，但他还是没有对我们怎么样。我感觉到他们是故意地不理睬我们。

他们吸了一阵后，一个个离开了盘子，站起来，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往地洞的深处走去。那个小小的长鼻人还扭回头对着我们扮鬼脸，一个露着奶头的大长鼻人——一定是他的妈妈——伸手把他拉走了。地洞里静悄悄地，只有那三只大盘子里的食物散发着香气。我们终于抵抗不住美味的吸引，蹑手蹑脚地靠到盘子前，顾不上危险，抓起那些好东西，狼吞虎咽起来。我们似乎刚开始吃，其实已经吃了许多。因为当那些长鼻人突然把我们包围起来时，我们本想逃跑，但是已经拖不动自己的肚子了。我们坐在地上，活象两只巨大的蜘蛛。

长鼻人的语言很怪，呱呱咕咕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明白。但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判断，他们没有恶意。后来他们在土台子前跳起舞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欢迎我们访问他们的地洞。他们跳的舞跟我们村子里正在流行的一种舞有点相似，也是那样简单那样机械，好像一群木偶。其中有两个母长鼻人，把我们拉起来，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跳舞。我们吃得太多，行动实在困难，但他们让我们跳我们不敢不跳。跳了一会，我们的肚子小了，感觉也舒服了。渐渐地我们忘了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也能听明白他们的语言了。跳完了舞，大家坐在一起说话，像开座谈会一样。于进宝小哥哥说，我们是两个饥饿的孩子，今天很幸运地来到了你们的地洞，受到了你们友好热情的招待，吃到了从来没

有吃过的最香最美的食物，我们真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孩子，我们回到上边即使马上死掉也不冤枉了。一个下巴上生着十几根白胡子的老长鼻人代表长鼻人发言，他说，你们不要客气，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两个，你们原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后来因为刮白毛大风把你们俩刮走了。我们几年前就知道你们俩在上边生活，而且我们还知道你们俩活得很苦。我们早就决定把你们俩请回来玩玩，但一直找不到机会，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所以你们来到这里就应该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或者说就像走亲戚一样。他说他们是嗅味的民族，根本不要吃东西，每天嗅一次食物的气味就可以了。他说如果我们不嫌弃他们嗅过的食品，尽管来吃好了，即使我们不吃，他们也要倒进暗道，流到蓝河里去喂四眼鱼。后来他们把我们送到井口，欢迎我们经常来做客，他们恳求我们不要把这里的情况对外人说道。我们对他们发誓：如果我们说了，就让乌鸦啄我们的脑袋。

刊载于2000年10月号《山花》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一九八八年九月）

“激进与保守”就是英文的所谓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我想说明一点，我所说的思想史上的conservatism跟radicalism，不是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派、激进派、革命派。我主要是讲，在思想上某些有意识发展出来的看法，而不只是从现在的行为来讲。所以我不涉及现在北京有谁是保守派、谁是激进派，当然现实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跟思想上的conservatism和radicalism是有关系的。

我所说的激进、保守并不是说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我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orientation。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两种态度我们常常看得见。

我们说某某人保守，某某人激进，都要有一个定点。如果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座标，我们很难说某人是保守的、某人是激进的。因为保守跟激进一定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说。相对于什么呢？一般说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讲，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用的时候，保守和激进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但是保守主义并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态度是相对于某一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必须先了解一种现状。从这方面看，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保守与激进，跟西方的甚至跟中国过去的都不同。

在美国讲保守主义，通常是用于一个政治意义的，就是说政治上的保守。Conservatism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不过，我在这里却要把文化的也放在里面。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到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现状在不断的改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我想说明的是：在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色。我想把这个变化简单的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炮利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接下来就是政治改革，这要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正式提出。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氏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康氏首先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他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取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鲜事物，这种思想激进得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其巨大。换句话说，既然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彻底的改换。这个改换当然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的碰到文化的问题。

到了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提倡白话文开始。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的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

的。并不像西方，有一个基本系统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些人要改变它多少。

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他们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

五四文化运动时，不少人是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根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了。科学所代表的精神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在中国比较重实用的传统中，或以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中，这是比较受压制的一种态度。

刚才我说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的不同，没有一个严格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出现。第一流的中国学人、思想家中也有人曾对保守的问题提出很深的看法，但他们也还是要变，不过强调不要变得太过，在变的时候要保留中国某些好的地方。但这些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五四前后的几年，个性解放一度提出，个人主义也一度出现。譬如胡适所提倡的“易卜生主义”（Ibsenism），可以说就是一种个人主义，妇女解放。可是这种东西都挡不过民族的危机。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他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西方人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本来认为民族主义是最落后、甚至

反动的东西。可是今天在非西方的世界，民族主义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所以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

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我们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孙中山先生也这样说过：必须牺牲小我的自由，然后才能获得大我的自由。这是个普遍的要求，在这个普遍的要求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式的自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在中国既然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自由的传统，民主是很难发展的。科学则不同，它可以凭本身的成就来取信于人，而民主则不能。

到了抗战，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这时文化的问题大家似乎已经不谈了。以主流的思想界而言，他们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在这个思想基调上，有些人就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是历史的法则的说法。中国当然还处在封建时期，还没有到资本主义时期。到后来共产党讲了半天也只能讲资本主义萌芽。但是马上又有帝国主义来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都是套西方的模式，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最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就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够，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愈快愈好！因此就不顾现实的条件。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到了二十年代中叶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做落后的东西。

简单的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造成现状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中国现状的问题。但抗

战后期，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以后，民族危机基本上渡过了，中国在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便立刻再度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主题。激进化的过程也以更大的速度在中国思想史上重新开始。这个思想的激进化仍是同一历史趋势的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民族危机而一度停顿而已。危机一过，它自然又抬头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愈来愈坏的现状不可能认同。因此彻底打破现状，建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是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文化上倾向保守的学人大声疾呼，要人们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但是这种呼声只能招来讥笑，而不能激起深思。这是因为受五四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认定现状的造成必须由传统来负责。西方式的民主理念虽然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那里还有销路，但市场也越来越小，不但激进的青年对它不感浓厚的兴趣，而且传统派的学人对它也拒多迎少。这种情形并不难理解；在一个中间阶层并没有力量而教育又不普及的社会，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确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的。

一九五〇年以后，中共依照史达林在苏联所建立的一套社会模式彻底改造了中国。在短短数年之内，废除了几千年来自然演进而成的一切制度和组织。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所有传统的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groups)如宗族、行会、私立学校、宗教组织、同乡会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者是名存而实亡。中国社会只有一个党的组织系统，从中央一直伸展到每一个家庭，以至个人。这确是一个全“新”的结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正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化的结果。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理不理解或接不接受这上“新”的秩序，大概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秩序确是“新”的，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动乱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现状，可以为保守或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社会座标。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上所出现的新现状很快的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作一说明。毛泽东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确是受过五四激进思潮洗礼的人。因此他不能认同于任何现状，一生都在激进化的历程之中。抗战时期他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但是等到实现这一主张的

时机出现时，他已抛弃了它。一九五五年他便认定“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来临，从此废除了私有制，在城市中消灭了工商阶层，在农村则收回了土改所分给农民的土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再过三年，他又不甘心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办“人民公社”，要立刻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了空前的三年灾害，不得不暂时退却。然而在经济刚刚恢复之后，他又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把这些一次比一次激进的政治行动都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激化，其中当然涉及无数内在和外在的、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只是要指出，象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解释。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的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号煽动群众则正是凭借了思想史上这一股激进化的冲力。

那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过程是不是已结束了呢？在最近这十年间，由于“改革”和“开放”的需要，我们重新听到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十年来的大陆知识分子确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象，他们的声音很多，不再是单调的直线发展。但是就其中表现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觉得激进化的历程仍未终止，不过倒转了方向而已。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

从思想的实质说，第一个循环是从“五四”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个体主义，迅速的向社会主义的一端转化。五四时代强烈的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是对于传统“名教”的反抗。但此后的民族危机日深却使“大我”淹没了“小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本无必然的联系，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群体为本位。在这一点上，二者终于合流了。以中国的特殊经验而言，其结果就是一个更具压制性的“新名教”秩序的建立。正由于第一循环始于摧

毁旧名教而终于建立新名教，所以今天第二个循环又不得不回到五四的起点，再度从个体本位出发。但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而言，第二循环的激进较之第一循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由于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薰陶下成长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切的体验。传统的道统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他们往往把集权体制看成中国文化的现代翻版，在这样的心态下，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

从文化的观点说，“保守”和“激进”这两种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态度在长程的发展中必须取得平衡。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改变，这是百余年来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态度。但是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的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对传统进行猛烈批判的人也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类的话，可惜只是门面话，不过为批判找借口而已。

矫枉不能过正，我绝不是提倡用“保守化”来代替“激进化”。中国百余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为了这一历程也已付出极大的代价。今后这一代价是不是可以变成历史的教训？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够超越“党同伐异”的政治意识？对于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说法，无论是保守的或激进的，都加以容忍？尤其重要的是：在激进思潮仍然高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养成一种文化上的雅量，对于保守的或近乎保守的言论不动辄以轻薄或敌视的态度对待？我愿意把这一系列问题作为这次演讲的暂时性的结论。

You ji feng chui shui shang lin
Sanmin Shuju, Taipei, 1991, pp. 199-242